

作为“白色噪音”的日常生活

——德里罗《白噪音》的文化解读

周 敏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德里罗《白噪音》里展示的后现代日常生活场景，指出在以物、消费和媒介为主导特征的后现代科层社会，日常生活成了后现代文化的演练场，不过，其间上演的并非只是消费文化逻辑的所向披靡，也有主体得到建设的可能。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及抵抗因素的观察和呈现，德里罗实现了他对当代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思考与批判。

关键词 《白噪音》 日常生活 后现代 抵抗

《白噪音》(White Noise)于1985年出版后，很少接受采访的唐·德里罗接受了美国作家及乐评人安东尼·蒂库尔提斯的访问。在访谈中，蒂库尔提斯请德里罗谈谈为什么他的作品对郊区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特别关注，德里罗如此作答：“在《白噪音》中，我试图找到一种日常生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的光辉。有些时候这些光辉几乎是可怖的，另一些时候它又是神圣、圣洁的。它真在那里吗？是的……但有些东西总是被我们错过……一些惊人的东西，盘旋在我们的可触、可见之外。”^①

《白噪音》问世二十多年来，尽管批评家从死亡、技术、灾难、家庭等创作主题，或从系统小说、后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文体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但对德里罗着力呈现的“日常生活”却关注不多。^②小说中弥漫

① Anthony DeCurtis, “‘An Outsider in This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 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9 (Spring, 1990), pp. 300–301.

② 与“日常”有关的论述可见 Susana S. Martins, “White Noise and Everyday Technologies”, in *American Studies*, 46. 1 (2005), pp. 87–113.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技术社会的主体并非只是“文化上当者”(cultural dupes)，“日常技术”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控制主体的力量，它同时也赋予主体“愉悦”(pleasure)，因此，日常的技术具有潜在的建设性力量。

的日常生活场景，就像“白色噪音”一样无所不在却寻之无迹。“白噪音”一词来自声音频谱图上表示噪声能量相等的水平线（这种水平线被称为白噪音或白噪声）。德里罗显然对“白噪音”于人的益处非常了解，他说：“有一种可以产生白噪音的设备，能够发出全频率的嗡嗡声，用以保护人不受诸如街头吵嚷和飞机轰鸣等令人分心和讨厌的声音的干扰或伤害。这些声音，如小说人物所说，是‘始终如一和白色的’……也许，这是万物处于完美之平衡的一种状态。‘白噪音’也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①也就是说，白噪音有三层意思：首先，它是一种技术性的保护，这种声音“始终如一”，是“白色的”；其次，它代表物质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平衡状态；第三，指一切人们听不见却无所不在的各类声音。其实，德里罗最初给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Panasonic”，这个英文词指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声音，但因其正好是日本松下公司的商标，后者又拒绝维京出版社使用，德里罗才将书名改为“白噪音”。正是在以上三层意义上，德里罗将日常生活比喻为白色噪音：它始终存在，自有其和谐的状态，尽管我们听不到它，就像听不见白色噪音一样。通过分析小说所呈现的构成当代日常生活的“物”、“消费”和“媒介”，本文主要讨论在看似被消费主义和媒介景观所渗透和殖民的后现代日常生活领域，个体是如何抵抗消费意识形态以及媒介文化的全面渗透的。通过对这些抵抗“战略”的分析考察，我们将看到后现代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可怖”与“神圣”之处以及主体在其中退却和建设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一、作为“物”的日常生活

《白噪音》的故事不算复杂，主要描写了大学教授杰克和他的家人在一个中西部小镇的生活。杰克一家有六口人：他和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第一和第四次婚姻娶了同一位女性）中的第四任妻子芭比特，还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们夫妇共同生育的。这便是吉登斯论及的现代社会所常见的“继亲家庭”（stepfamily）形式：“如今有许多人，成人和孩子，生活在继亲家庭中，继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有两个母亲和父亲、两个家庭的兄弟姊妹以及由于父母多次婚姻

^① 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而牵涉到的其他一些复杂的亲属关系。”^① 不过，尽管姻亲关系复杂，这还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美国家庭，丈夫杰克是山上学院希特勒研究系主任，妻子芭比特是家庭主妇，偶尔出去做些义工。围绕着这一家人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小说展示了一个充满“异化”特征的后现代日常生活的动态画面，一个热火朝天、离奇荒诞的“物”之海洋的滑稽景观。

小说一开头，从主人公、叙述者杰克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他所就职的山上学院的开学场景，这是一个由“物”所主导构成的日常生活图绘：

中午时分，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鱼贯穿过西校区，然后缓缓绕过橘黄色的工字钢雕塑，向宿舍区行进。旅行车的车顶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心地绑着的手提箱里塞满了厚薄衣服；盒子里装着毛毯、鞋子、皮靴、文具书籍、床单、枕头和被子；有卷起的小地毯和睡袋；有自行车、雪橇板、帆布背包、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马鞍、充了气的筏子。当车子减速缓行并终于停下时，大学生们立即跳下车，冲到后面的车门，开始卸车内的东西：立体声音响、收音机、个人电脑；小冰箱和小拼桌；唱片盒和音带盒；吹风机和烫发夹；网球拍、足球、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管制物品、避孕药丸和器具；还有形形色色仍然装在购物袋里的小吃——葱蒜味土豆片、辣味干酪玉米片、焦糖奶油小馅饼、名叫华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水果软糖和奶油爆米花；达姆汽水和“神秘”薄荷糖。（《白》：3）

杰克是从他的办公室看到的这一切，他对此并不陌生，二十多年来这样的景象他每年九月开学之时都能见识一次。本应是学校主体的大学生们完全被“物”所包围，他们的出现仿佛就只是为了把这些物品从车上卸下来，而他们自己则几乎完全消失在“物”的海洋中。作为大学教授的杰克没有看到学生的其他任何细节，只有德里罗不厌其烦地以 18 行的篇幅描述的将学生们完全淹没的各式各样的商品。而且，这些学生自身也成为了现代教育的“原料”和“产品”，以“商品”或“物”的形式呈现自己。小说描写道，载着这些学生来到校园的旅行车仿佛“闪亮的长龙”，学生们一个个从车上“跳”（sprung）下来。这里，英文“sprung”的意思是“被弹出来”，学生与“物”的关系不言自明，他们就是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16.

文化流水线上被一个个制造、弹送出来的产品。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精英教育相反，如今，位于再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后现代知识主体已经演变为可资交换的物品，而如果这些学生到学校是购买教育这个商品，他们本身就在“商品”这个词语最真实的含义上是由商品制造的商品，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就这样演变为了“教育拜物教”。

回到家中，杰克告诉他的妻子芭比特自己白天看到的景象，现在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旅行车：“今天是旅行车大聚会的日子……车子多得排到音乐资料馆还过去，一直上了州际公路。蓝的、绿的、绛紫的、棕色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就像是一只沙漠旅行车队。”（《白》：5）芭比特听后的反应是：“我倒不是想看旅行车。那些人什么样子？女人们穿格子短裙和针织毛线衣吗？男人们是不是穿骑马外套？骑马外套什么样子？”（《白》：6）就像杰克只关心汽车一样，芭比特关心的只是这些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杰克和妻子各自的兴趣所在正是消费社会主体的思考方式，个体身份由外在于其自身的符号物所构成，主体性在这样的“物符”之链中被无限悬置，进而成为“空心人”。制造这些“空心人”的便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消费被控制的科层社会”，其中，社会人被他人和自己眼中的物所定义，也借此来定义自己。围绕这些“物”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隐形而流动的技术—消费体制或精心设计而成的“次体系”（sub-systems），而这些“次体系”，用波德里亚的话说，是作为当代社会简明扼要的身份（地位）结构象征的“普遍符码”，它“是极权的，没有人能够逃脱它”^①。无论是那些学生，还是杰克和他的妻子，都无可避免地陷落在这一个又一个“次体系”之中。现代社会就是由大量的“次体系”所支配，而真正统治世界的“现实”——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却从来无需出场，因为“次体系是一整套支撑着特定社会空间的核心意义的产物，因而它获得了吸引与排斥的力量；这是一种格雷马斯意义上的同位素。语言的核心吸收着活动，剥夺着它的自发性，以适应为代价，将行动与技能转变成符号和意义”^②。

自从第一辆福特轿车被制造出来，汽车成为了美国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次体系，它不单是“物”，更是消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技术体系的代表化身，是全方位地组织规划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技术替代体系。《白噪音》中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有着汽车的影子。杰克和他的同事驾车去著名的“美洲照相

① 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214页。

②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100.

之最”农场，在那里他们看到临时停车场上“停放着四十辆小车和一辆旅游大客车”（《白》：12）。显然，人们都是驾车或乘车来参观这个旅游胜地的。我们或可认为，倘若不是汽车的发达，这个旅游胜地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前来，“心甘情愿地成为一种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此外，在《白噪音》一开头我们就看到了汽车的出场，学生们乘着旅行车，车上载着规定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日用品。这些学生的父母则站在车子旁边，虽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仍“从各个方向看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白》：3）。

不过，虽然物构成了无从逃脱的“次体系”，构成了现代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但在杰克对这些父母的观察之中，我们却看到了日常生活的些许神秘之处。在眼前这些对物的沉醉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深刻的精神性渴求：“他们感到一种新生和一种共识……眼下的这个旅行车大聚会，如同他们一年里会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正式的礼拜仪式或法律条文，更明确地让这些父母明白，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连的人，一样的民族，一样的国民。”（《白》：3-4）这些父母是被物异化的存在，但也正是使他们异化的物的集合令他们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归属，就像在农场所经历的“集体感觉”。尽管这种归属感不乏讽刺，但也反映了被消费和物所殖民的个体精神深处的需要：人们仍然需要归属感，哪怕它是虚幻的。而且，虽然日常生活中带给他们归属感的正是钳制了他们个体存在的“物”——无论是大学生带到学校的各样物品，还是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抑或是杰克的妻子最关心的服饰，但是，如同本雅明笔下的“收藏家”通过收藏而剥夺了物品的商品性质以及实用的枷锁^①，《白噪音》中的消费社会的主体也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对物的占有部分抵御了其异化的铁钳，将其反转成精神深处的一种满足感、从属感。

二、作为“消费”的日常生活

消费社会的物与传统意义上的物已大不相同。在过去，物对于人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品”，人们使用它们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而现在的物则成了“符号”，人们不再注重其使用价值，而更加注重“物”本身所蕴

^① 本雅明写道：“收藏家是这个内部世界真正的居住者。他以美化事物为己任。落在他身上的是西西弗斯的任务，这就是通过占有它们以剥夺物品的商品性质……当然，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需求仍如日常世界一样无法满足。但在这个世界中，物品摆脱了实用的枷锁。”（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Verso, pp. 168-169）

含的社会意义。对“物”这种“象征符号”的主要占有方式无疑是“消费”。在《白噪音》中，德里罗对记者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光辉”是通过消费文化的团体化力量展现的，而且，主要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超级市场——里表现出来。消费文化的隐性逻辑是个体化，以商品的个体化风格满足人们对个性的追求，从而为消费者制造出各种各样他们本来没有意识到的需求欲望。按照现代消费理论，超级市场“清除社交，因为那会延缓销售”^①。通过激发消费者“普遍的第三人称意识”^②，购物活动把购买者分裂为有着分离的“需要”的集合体，购买活动中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商品和消费所赋予的“第三人称”意识所置换，产生虚幻的认同感。^③与对消费的普遍否定和质疑不同，在《白噪音》中，德里罗使我们看到，在超级市场购物倒是为“继亲家庭”日益松散的家庭成员提供了彼此交流的机会，超级市场也因而成为个体抵制日常生活压制性的场所，是日常生活的“光辉”得以闪耀的地方。

丹妮斯和斯泰菲的学校因突发毒气泄漏事故遣散了学生，两个孩子不得不整个星期都待在家里，杰克于是决定带她们去超级市场购物。他并没有解释这么做的原因，但显而易见孩子们很高兴。在这“极为凉快”的超市里，孩子们和父母更像是一家人，他们互相关心、彼此交谈、分享问题、加深情感，这种情形在这个姻亲关系复杂的家庭里十分少见。在水果部，斯泰菲拉起爸爸杰克的手，此时这对在家几乎从不交谈的父女展开了充满温情的对话：“你有没有对丹妮斯表示你的歉意？”“也许以后吧。”斯泰菲说，“提醒我。”“她是一个温柔的姑娘，如果你允许的话，她想做你的好姐姐和朋友。”“我不知道什么叫朋友。你不认为她有一点儿喜欢指使别人吗？”“你除了向她表示你的歉意之外，一定要把她的《医生手册》还给她。”“她总是在看那东西。你不觉得这事古怪吗？”“至少她在读点儿书。”（《白》：38-39）在一个商品海洋中最为接近自然的地方——水果部，女儿挽着父亲的手，一个是温柔的父亲，一个是调皮的女儿，他们在交谈。我们几乎可以忘记这是个“消费被控制的科层社会”，他们谈论着姐姐，谈

① Thomas Hine, *The Total Package: The Evolution and Secret Meaning of Boxes, Bottles, Cans and Tubes*, Boston: Back Bay Books, 1997, p. 2.

② 在德里罗的处女作《美国志》（1971）中，德里罗使我们看到，电影和电视广告的影像使人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与广告影像所许诺的梦想身份的认同。由此小说人物由第一人称意识转到第三人称意识，因为电影和广告之中包含了“那个普遍的第三人，我们都想成为的那个人。广告发现了这个人。它用它来表达向消费者所敞开的可能性”（Don DeLillo, *Americ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p. 270）。

③ See Harvie Ferguson, “Watching the World Go Round: Atrium Culture and the Psychology of Shopping”, in Rob Shields, ed., *Lifestyle Shopp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21-39.

论着妈妈，在向爸爸透露妈妈服用药物的秘密之后，女儿显然觉察到了父亲的忧虑，父亲也感受到了女儿的关怀：“斯泰菲握住我的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那样子是为了让我放心，而不是像我开始想的那样表示对我温情的占有。我感到有点儿吃惊。紧握我的手，帮我恢复自信心，使我不至于被任何忧郁的情绪左右——她认为发现了某些忧郁的情绪正在我身上排解不开。”（《白》：42）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关爱，在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超级市场里面闪耀出来的这种亲情，使得他们超越了汪洋万“物”，在购“物”的天堂实现了对“物化”关系的超越，回归了最为自然的父女亲情，通过消费行为自身实现了对消费的抵抗。

不仅如此，在《白噪音》中，消费还能成为自我实现的狂欢节。日常生活反对压制之时就是狂欢之际，那时个体可以暂时摆脱消费社会的铁钳，以消费的形式践行自己的主体身份。狂欢节最主要的活动形式就是小丑的脱冕与加冕。当杰克脱下在学校穿的长袍、去掉墨镜以后，他作为希特勒研究专家的教授身份便不复存在，变成了一个“正在衰老、不大显眼的大个子家伙”（《白》：93）。虽然杰克很清楚自己所谓的希特勒专家身份之虚妄，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一个“不大显眼”的人，于是他来了“购物情绪”，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大肆采购。带领家人购物时他感到“在价值和自尊上扩张”，感到“使自己充实丰满了，发现了自己新的方面，找到了自己已经忘却的存在过的一个人。光辉降临在我的四周”（《白》：93），就像加了冕的小丑。

如果说消费带给杰克的是一种虚妄的身份和价值感的话，它的确也使得他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们全家为此番大购物而喜气洋洋。我终于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参与购物了。”（《白》：93）不过，虽然购物给家人带来了狂欢节般的整体感，而且给杰克带来了成就感，但我们也看到，这种以消费为基础的整体感和成就是没有根基的，并不能够持久，所以消费活动结束后大家都“期望独处”，他们“静悄悄地驾车回家”，“走进各自的房间”（《白》：94）。购物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光辉”就像是狂欢节中的加冕仪式，待到节日结束，脱冕是必然的，而日子还是一如既往。

三、作为“媒介”的日常生活

当代日常生活的另一重要构成是无所不及的媒介。媒介不仅是我们的外在环境，而且也正在成为日常生活自身：“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在这个

图像的漩涡里，观看远胜于相信。这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① 媒介的全方位存在使得当下成为一个图像统领日常生活的时代。德里罗充分意识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被影像记录的时代，他在《白噪音》中向我们显明了美国进入后现代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媒介形式，如收音机、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整个时代的精神主体，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症候，必须被视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白噪音》中，孩童的思维结构已经被电视的逻辑所辖制。斯泰菲睡梦中的呓语是丰田汽车的电视广告词：“Toyota Corolla, Toyota Celica, Toyota Cressida.”（《白》：171）在杰克看来，女儿的呓语好像是“具有宗教仪式意义的词，是有魔力的咒语或者是出神入化的圣歌片断……[这些广告词是]超国别的名字，由计算机合成，几乎在全世界都一样发音。属于每一个孩子都有的脑噪音的一部分，藏在深不可测的寂静的区域。不管这种声音来自何方，都令我强烈地感到片刻辉煌超越的冲击”（《白》：171-172）。与生产世界和政治世界所要求的不同，媒介文化需要相应的某一类身份、某一类主体，而电视广告就是制造这种主体的最好介质，它以个性和主体的名义剥夺了受众的主体，使得他们就连在睡梦中的呓语都由广告词构成。电视以及电视所传播的信息不仅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德里罗这里，甚至已经成为孩童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了他们的潜意识。

不仅如此，在媒介信息所主宰的社会中，媒介信息所表征的现实已经比现实更加真实，就如同小说中的“美洲照相之最”农场一样。“农场”自身在此早已让位于“农场”被拍摄的景观，人们从各地赶来，所有的人都带着照相机。杰克同事默里就认为，“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捕捉一种形象，我们之所以在此是来保持这种形象。每一个照相的人都强化了这儿的气氛……来到此地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我们所见的仅是旁人之所见”（《白》：13）。这样的日常生活景观就是波德里亚所说的后现代世界的总体特征“拟像”。“拟像”的世界是一个彻底被符号操控、统治和架空的世界。在这个通过符号而复制出来的世界中，所有真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真实所吸收，拟像与真实之间界限的内爆造就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其中媒介传达的信息往往比世界自身直接呈现的自然现象更加真实。杰克的儿子海因利希就更加相信经由媒介代码所传达的自然现象，现实的情况是天空正在下雨，可由于收音机的天气预报说晚上下雨，海因利希宁肯相信“雨

①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要到晚上才下”，而对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雨珠视而不见。在他看来，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详见《白》：23）。现实世界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媒介化的存在样态，人们藉由媒介工具而不是自身感官来获得对世界的经验和认知。正如大卫·考沃特所说，“德里罗理解媒介如何影响了美国人对现实的看法。这些没有根基、没有中心、极端两维的影像构成了美国人试图了解自己的话语”^①。无所不在的媒介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波与辐射”，构成了“美国家庭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闭、永恒、独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们的起居室中降生的一个神话，就好像是我们在梦境和潜意识里所感知的某样东西”（《白》：55）。

但另一方面，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也并非总是一种压迫性的在场，相反，就像上文所讨论的“物”和“消费”活动的反异化作用一样，媒介也能成为赋权的方式和连接的力量。《白噪音》中，每个周五晚上杰克一家都要在饭后聚在客厅一起观看电视。在妻子芭比特看来，“如果孩子们每周一个晚上与父母或继父母一起看电视，其效果就是让电视在他们眼中失去魅力，并使它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电视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脑筋的可怕力量就会减弱”（《白》：16）。通过一家人集体观看电视这种举动，芭比特希冀反过来减少和消除电视对孩子们的影响。既然孩子们的意识已为电视所控制，那就让全家人一起观看，让孩子们意识到这些电视内容的荒谬。不过，这种通过对媒介自身的“挪用”而“抵制”它的行为，按德赛都的说法，本质是一种惰性的反抗，一种“微观的发明”，只能提供暂时的解脱而不是解放^②，事实上，如同杰克意识到的，“这样度过的晚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微妙的征罚”（《白》：16），海因利希的眼睛并不盯着电视，而是“一声不响地坐着吃他的蛋卷”（《白》：16）。

除了电视媒介，德里罗曾告诉记者，在《白噪音》中，“或许超市里面的通俗小报最接近本书的精神”^③。通俗小报通常被视为低级趣味，但在《白噪音》中，德里罗不断引用通俗小报中的新闻故事，因为“小报中的未来自有其特殊的机制，它总是让人满怀希望地转移到启示性的事件，它也许与我们自身的直接经验并不非常遥远”（《白》：161）。以一种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通俗小报满足了人们对超验的追求，“它们提出关于死亡、来生、上帝、世界和空间的重要问题，但它

① David Cowart, *Don DeLillo: The Physics of Language*,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 132.

② See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97, p. 213.

③ Don DeLillo, "I Never Set Out to Write an Apocalyptic Novel, Interview with Caryn James",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3 (Jan., 1985), p. 31.

们存在于一个几乎是流行艺术的氛围之中”^①。在德里罗看来，通俗小报上所刊登的内容，虽然在现代科技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提出的恰恰是重要的问题，而且，“这种故事深藏在潜在的信念之中。它躲在那儿，让人感到熟悉，并以其自身特殊的方式宽慰人心”（《白》：159），通过阅读通俗小报，“出于某种有关大规模毁灭的持续感觉，我们一再地想像出希望来”（《白》：162）。超市里的通俗小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如果说它代表了《白噪音》的精神内核，那么可以认为日常生活也在尝试超越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死亡恐惧和技术灾难，虽然效果有限。

“人必须是日常的，否则根本就不存在”，日常生活是人类“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生活现实。^② 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已演变为一个宛若白色噪音般由种种物体系、媒介和消费逻辑所构成的“消费被控制的科层社会”，其中不仅有消费魔力的压制和暴力，也有那些不能为工具理性所收编的诸如身体、感性、欲望等元素，使得日常生活中充满着“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从而赋予主体以反抗的可能。^③ 在《白噪音》中，德里罗使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之中既有惊奇也有危险，既有奇妙也有恐怖；他还使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的白色噪音之后，依然有色彩斑斓的希望之光，它们可能只是波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抑或巴特意义上的现代神话，但只要看到了，就不会消亡在白色噪音之中。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里罗的小说与当代美国媒介文化”（11CWW010）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意识形态批判研究”（NCET-11-06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敏，女，1971年生，河南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化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德里罗的语言观》（载《外国语》2014年第5期）、《媒介生态学》（载《外国文学》2014年第3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Don DeLillo, “I Never Set Out to Write an Apocalyptic Novel, Interview with Caryn James”, p. 31.

② 详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生活世界的结构》，收入尹树广编《后结构·生活世界·国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③ See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New York: Verso, 2006, pp. 21-22.